

ZHONGGUO JINXIANDAI JIAOKESHU SHI

中国近现代

②

石鸥 吴小鸥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教科书史

CIS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

ZHONGGUO JINXIANDAI JIAOKESHU SHI

石鸥 吴小鸥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序言

X U Y A N



中国的教育，几乎是与教科书（教材）“携手并进”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和《千字文》，以及更高层次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曾经是长时期里教育的重要材料，离开它们，几乎就无法谈教育。在教科书（教材）身上，印刻着教育发展的脚印，折射着历史变化的痕迹。

但中国古时候没有近代意义的学制，没有普通学校，没有分科课程，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现代学校所称的教科书，也没有教科书一说，甚至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们不是真正的教科书（仅仅是教材而已，教科书属于教材，但教材不等于教科书）。我们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使用；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对教师的教学有具体的建议；第三，依据教学或课程计划按学科课程分门别类地编写使用。依此标准，以前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因为它们在程度上是模糊而不分级的，在分量上是主观而不分课时的，在教和学上是完全随意的，只能由教师自己把握，在内容上是笼统而不分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们不是严格的教科书。初具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名称始于19世纪70年代后。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学会），曾先后编辑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除供教会学校使用外，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使用。“教科书”一词也因此逐渐流传开来。而严格意义的现代教科书在我国产生，应该在19



序
言

001

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新学制出现了，新学堂迅猛发展，适应新学制新学堂需求的教科书也就大量涌现。

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把近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肇始时间放在教会学堂的大量出现及其对教科书的强烈需求，也即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所以我们的研究也以此为上限。

这100多年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我们以1949年为界，分成两大阶段。1949年前的阶段，构成上册内容，它可以划分为西方教科书的引进时期（19世纪60年代—19世纪末），这基本上是西方教科书的翻译引进阶段；民间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教科书的引进与自编自创结合、引进逐渐被编取代的阶段；教科书的审定与制度化时期（20世纪初—1926年），这是教科书定型与稳定阶段；多种政治制度并存下的教科书发展时期（1927—1949年）。而中间两个时期（大约在1897—1926）又构成了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30年，繁星般的单品教科书与成系列的、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大型成套教科书双轨并行了好长一段时间，满足了不同学校不同师生的需求。1949年后的阶段，构成下册内容，它可以划分为新中国17年、文化大革命10年和改革开放后三个大的发展时期。

黄金30年教科书发展时期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从教材到教科书的转型过程中。时间大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10年。其特征是广义的教材、读本逐渐被教科书取代。一批新式学堂已经不满足于从西方引进或翻译或改译教科书了，它们自己开始编写适合自己需要的教科书，代表者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公学堂、上海澄衷学堂、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民间书坊进入教科书开发领域，各式各样的教科书出现了，代表者为文明书局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清政府的“学部教科书”。漫长历史时期里，“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等都是不可撼动的经典教材，但是当1903年新学制颁布、新课程实施以及紧接着的科举废除后，理论上它们就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尽管有人尽力挽救这些教材，安排了读经课程，但这些抵抗实际上已经无济于事。到“最新教科书”出现时，教材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典教材不得不退出。在文

本意义上真正统一了教与学的教科书全面登场，完成了由纯粹的教本、学本向教学组合文本的过渡。

黄金30年教科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开始于民国元年，新的体制要求新的教科书，旧教科书退出，新教科书雨后春笋般涌现。代表者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规模大，种类全，教授法配套，市场竞争开始激烈……这是其基本特征。小规模、零散品种的、影响小的书坊教科书和学堂教科书纷纷被挤出市场。

第三个高峰出现在1922年新学制以后。适应新学制的需要，大量新学制教科书产生。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知识分子加入到教科书编撰的行列，在教科书的封面或版权页上不断闪跃出蔡元培、胡适、冯友兰、顾颉刚、任鸿隽、陈哲衡、竺可桢、叶绍钧、周子同、吕思勉、萧友梅、朱经农、吴研因、杜亚泉、王云五、张其昀、万国鼎、陆志韦、张资平、黎锦熙、钱基博、金兆梓、何炳松等一大批让人景仰的名字。商务、中华两大书局把控的教科书市场也被新起的世界书局挤了进来。

19世纪20世纪之交，本土与外域的持续碰撞，救国图存的全民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求新维新、变革变法的国家追求，使得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刻。政治变革出现了，科技求强出现了，现代教育出现了，一批最不能遗忘的教科书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场景和一个特定的地域，演绎了一幕思想大启蒙、知识大传播、科技大普及的历史教育剧。这以后，我国教科书就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日益规范，日益统整，日益标准化，但也少了些许生气和创新的锐气。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教科书蓬勃发展起来，局面精彩纷呈，然而在此期间，在这个庞大复杂的领域，一些变化也在水面下缓慢而悄悄地发生着。随着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强化，政府对教科书控制的加强，不知不觉中，大量印数不是很大的、有各自特点与风格的教科书逐渐消失，部分教科书日益显示出其统治地位或垄断地位，教科书日益板起了正规的、严肃的、平稳的面孔，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转变完全实现。教科书质量稳定了下来，但野性、新鲜劲、创新气势也被遏止了。教科书黄金时



代彻底结束。

中国教科书黄金时代的结束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入侵，全面抗战后，出版机构受到严重破坏，上海的出版事业几乎全停，转移到重庆的分支机构也不景气，仅仅只是维持，而此时政府的官营出版机构赢得了发展的好机会。标准的、示范性的或国定教科书时代开始替代黄金教科书时代。

值得说明的是，在相对平稳的三四十年代，中间的抗战时期显示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小高峰。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二元对峙，逐渐分割成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足鼎立”的不同政治局面。这三个政治时空划分形成了不同政治环境下的教科书新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教科书话语特点。但国统区也好，根据地也好，教科书的主题和内容迅速集中在有利于抗战救国的领域。教科书的社会动员与宣传功能发挥到极致。

1949年后的教科书已经与这之前迥然不同了。革命者眼中只有胜利后的喜悦，以前教科书的遗产和传统对他们而言尽可能束之高阁。他们必须尽快的以统一的新政权思想与话语的教科书取代过渡过来的包括国统区、根据地等各种背景的教科书。这一时期，新中国教科书出色地完成了社会急剧转变后带给人们的震动、不安与茫然的化解，同时更深刻地引导人们对正在兴起的共产党政权的发自内心的拥护。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而言，那个时代是不主张柔情不主张小心求证的，是反对个体的，它呼唤群众运动，呼唤跃进、高昂、激情、美好、乐观。在整个1949—1966年这17年里，编作者们尽管经常面临各种困难与压力，但却给中国教科书建设带来了全新的主题、叙事方式、文本语言与编撰模式。

十年“文革”教科书，对于受教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是历史记忆中难以忽视的部分，是那个时代官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具象。它把意识形态的演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文革”教科书插图人物男的高大勇猛，女的丰满威武，适应特定的政治美学需要，红彤彤的教科书成了非常年代的特殊文化现象，这是一个时代的教育、政治、文化理念的标本，尽管它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戛然而止，但它的方

方面面——包括它关注生产、关注现实的精神（即便是那样的极端和功利）——毕竟具有教育史的经典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科书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既有生机勃勃的局面，如八套半教科书的改革、实验教科书、地方教科书和乡土教科书的迅猛发展等；也有相对单调的时期，“教科书代表国家意志”的口号配以把赌注都押在主流的、垄断的教科书上的政策，导致为教科书制度史留下特别值得可圈可点的贡献很少的局面。整体上，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的教科书仍然具有鲜明的泛政治性。背记，无休止的背记，而背记是与灌输密切联系的——这时期的教科书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尽管它最标榜的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21世纪的课程改革，不仅以教科书的多样化在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上掀开了有声有色的一幕，也展开了对中国百年教科书现代化历程的强有力的制度性升华——走上了一条回归多样化的否定之否定之路。只有在清末民初黄金30年期间，才有这么多的机构参与到教科书的编撰与出版行列，才调动起社会如此庞大的能量加入到教科书的建设之中，才让这么多教育界以外的人们如此微观如此细致地关注到课堂关注到学生。百年前教科书建设的一幕于不经意之间再次在百年后掀开。

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21世纪10个年头过去后的今天，教科书多样化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主流的”“示范的”“国定的”教科书声音不断回响，曲折与反复说来就来。

我们更注意到，时代气氛变了，教科书内容也在变。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的教科书曾经热衷于反抗传统、形塑思想、期盼理想，歌颂新的领袖与国家，建设新的社会与生活，对历史的继承与人性的尊重不会关心（这到六七十年代达到极致）。那么21世纪的教科书则对反抗传统、形塑思想、期盼理想之类的精神培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这是一个要求最低限度的精神淬炼和鼓励最大限度的自我张扬的教科书时代，缺乏人心的敬畏和震撼，但充盈着对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的关照——在教科书史上似乎还是头一回。对它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朗朗书声，百年余音。在百年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中，教科书内容与形式

同政治政权、文化文明之间的互动是那么的显而易见，以至于读百年教科书就是在读一个历史的变迁，在读百年文明演进史。百年教科书大致与百年历史相仿佛。它不仅是对激荡的20世纪的记录和目击，而且它本身也是激荡的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稍嫌夸张地说，清末民初，教科书主要是图存求强、普及西学的启蒙书；20世纪30—40年代，教科书主要是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宣传册；50—70年代，教科书则成为“革命文化”的红色传单；80—90年代，教科书充斥着对未来、对世界、对现代化的憧憬；21世纪以来，教科书日益成为孩子们的实践操作指导书。

这里，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试图对百年来普通中小学各种教科书给予一定的关注。但我们认为，教科书的历史绝不是所谓主流或统一或通用或国定教科书的历史。发行量或畅销不是优秀教科书的唯一标志。发行量或畅销有时候是靠质量竞争的，是读者自愿造成的，如民国时期的《共和国教科书》等，但有时候发行量或畅销是靠垄断，没有其他教科书，或者你不能用其他教科书，是逼着读者使用的教科书，如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国定教科书。所以，我们的研究关注没有局限在主流或国定或通用教科书上。我们只有同时关注到穿插、连贯在所谓主流教科书之间的许多无名气的教科书，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教科书的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

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百年时光，历史无限，我们不可能对所有教科书涉及的所有方面都给予一样的强调。我们研究的重心是依靠教科书实物支撑的。好在有这些丰富的教科书实物，使得我们的研究少走很多弯路，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具实证价值，有时候，版权页上的或书本中的东西确实让我们很是头疼，因为它和我们教育理论研究上的某些结论相冲突。此时，我们更多的服膺于教科书实物。这也是本书的特点。

还要说明的是，影响教科书研究的突出因素是当时师生使用教科书情况的资料阙失，我们几乎无法从师生的角度来评判教科书质量。我们只能借助暂时方便借助的实物，这显然是有缺陷的。

好在研究无止境。

第1章 国门开放与西学教科书之引进 (1840—1896)

第一节 西学教科书的引进

- 一、教会学校的发展 / 004
- 二、教会出版机构及其西学译著 / 006
- 三、“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及其影响 / 011
- 专栏1 “教科书”一词的出现 / 015
- 四、早期西学教科书举隅 / 016

第二节 中国近代最早系统的西学教科书

- 一、傅兰雅与《格致须知》 / 031
- 二、艾约瑟与《西学启蒙》 / 038

第三节 洋务学堂对西学教科书的引进

- 一、洋务学堂的兴办 / 044
- 二、京师同文馆：课程与教材 / 047
- 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及其译著 / 055

本章小结 / 063

第2章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之开端 (1897—1911)

第一节 学堂教科书

- 一、新式学堂与教科书发展 / 068
- 二、南洋公学教科书 / 070
- 三、其他新式普通学堂教科书 / 077
- 四、新式大学堂教科书 / 086

第二节 书坊教科书

- 一、民间书坊与教科书的发展 / 091
- 二、文明书局及其教科书 / 093
- 三、商务印书馆及其早期教科书 / 109
- 四、百花齐放的其他书坊教科书 / 122

第三节 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

- 一、《最新教科书》系列 / 144
 - 专栏2 蔡元培与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的发展 / 150
- 二、最早的国家官编教科书 / 154
 - 专栏3 张之洞与“唱歌教科书” / 168

第3章

中国现代教科书之定型 (1912—1927)

第一节 民初教科书的精彩纷呈

- 一、共和政治与教科书革命 / 173
- 二、教育思潮与教科书的积极探索 / 193
- 三、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教科书的兴盛 / 208

第二节 新学制教科书的多样与成型

- 一、新学制改革及《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的颁布 / 225
- 二、三大书局的新学制教科书 / 228

本章小结 / 249

第4章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和特色教科书 (1903—1927)

第一节 宽松有序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 一、《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确立教科书审定制度 / 253
- 二、学部审定教科书概况 / 257
- 三、民初教科书审定的变化 / 264



第二节 异彩纷呈的特色教科书

一、留日学生与汉译日本教科书 / 270

二、白话教科书 / 278

三、女子教科书 / 289

四、乡土教科书 / 297

专栏4 刘师培与乡土教科书 / 308

五、实验与校编教科书 / 312

本章小结 / 330

第5章 教科书的模式化时期 (1927—1937)

第一节 党化教育及其教科书

一、“党化教育”的确立与实施 / 333

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教科书 / 342

三、训育教科书 / 356

四、昙花一现的“党义教科书” / 359

第二节 课程标准及其教科书的日益规范

一、中小学课程标准的修订与完善 / 367

二、新课程标准下的主要教科书 / 376

专栏5 开明书店和世界书局的教科书版权纠纷 / 410

本章小结 / 416

第6章

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教科书（1937—1949）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区教科书

- 一、国统区教育政策的变化 / 419
- 二、国立编译馆和国定本教科书 / 426
- 三、正中书局的《新中国教科书》 / 441
- 四、各类战时教科书 / 444
- 五、侨民教科书 / 457
- 六、战后教育的复原与教科书 / 461

第二节 汪伪国民政府教科书

- 一、汪伪国民政府教育政策 / 465
- 二、汪伪政府的教科书审定 / 467
- 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教科书 / 471
- 四、教育总署（部）编审会教科书 / 473
- 五、汪伪国定教科书 / 477
- 六、伪蒙政府教科书 / 482

第三节 伪满洲国教科书

- 一、伪满洲国奴化教育 / 485
- 二、伪满洲国教科书及其阶段特征 / 492
- 三、伪满洲国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 / 509

本章小结 / 513

第7章 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教科书（1927—1949）

第一节 中央苏区的教科书

- 一、中央苏区中小学教育概况 / 518
- 二、苏区的中小学教科书 / 520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科书

- 一、抗战时期根据地中小学教育概况 / 527
- 二、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科书 / 532

第三节 解放区教科书

- 一、解放区中小学教育概况 / 565
- 二、解放区的学校教科书 / 568

本章小结 / 582

第1章

国门开放与西学教科书之引进 (1840—1896)

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每代各有不同，但就中国近代而言……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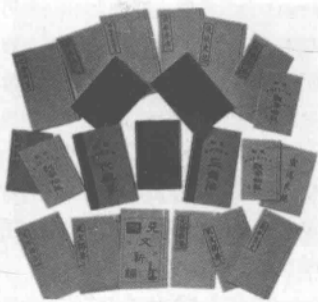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引言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既处在清王朝统治的后期，也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末期，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到顶峰，经济上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日益严峻的情况是，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国人昧于世界大势，盲目自大，不能以一个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与此同时，世界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英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资源，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潜在市场。历史让我们记住了1840，这一年，英国侵略者以中国禁烟为由，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著名的鸦片战争，随着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不但被勒索赔款，而且还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等，英国人用野蛮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出征服世界的通道。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驻京，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中国损失了越来越多的主权甚至领土。古老的中国开始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裹挟进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之中。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写道：“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使固守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封建末代王朝出现了“天崩地裂”的历史性转折，在西学东渐的传导和选择中，开始了步履维艰的现代化起步。

在这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新式教育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才、知识与智慧支持。新式教育的主体是新式学堂，而新式学堂的核心是新式教科书。教科书是学校教学中重要的和基本的教与学的材料。科举时代，没有近代意义的新式教育和新式学堂，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进而读“四书五经”，我们称之为教材，不是现代意义的教科书。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伴随着教会学校以及洋务学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当时大量的西学教科书被引进，拉开了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的帷幕。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第一节 西学教科书的引进



教会学校引进的西学教科书概览

西学亦称“新学”，这一概念是历史的产物，一般指从16世纪末开始由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介绍来中国的西方科学文化。李约瑟博士曾认为，在“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了”^①，但“因为受到历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抑制科学发展的那种因素的影响，这种融汇进行得很慢”^②。在

中国近代社会所遭受的被西方列强“挤压”的特殊境遇中，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近代学科分类为标准建构起来的新知识系统由于西学教科书的引入而大量引进，而西学教科书本身最初是随着教会学校而引入的。如果说明末清初所输入的西学，具有新旧杂糅的特点的话，那么，这一阶段伴随着教科书大举进入的西学，则几乎全部属于新学。

①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37.

② 梁启超.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J]. 科学，1922（7）.